引　言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东汉年间传入的佛教，一次是明清之际传入的基督教。在同这两次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流之中，中国文化发生了变迁。

到慧能时，佛变成了禅，禅宗代替了其它宗派，印度哲学融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带来了“西学”，它受到了实为思潮的欢迎，天学与实学相融不仅从根本上瓦解了空谈心性的晚明阳明心学，也为以后的乾嘉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材料。

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文化的交流受到地域的影响，中国哲学对域外的影响主要在亚洲地区，其中中国哲学对朝鲜、日本、越南的影响是人所皆知的。大航海时期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开始了一体化的过程，此间，明清间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双向性的特点，“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同时进行。17～18 世纪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思想的演进，也为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汉学奠定了基础。

历史是思想的基础。

通过对这种哲学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交往中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没有同异质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和哲学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哲学所以到今天还有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吸取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和哲学早已不是在“轴心期”时所确立的那些基点，历史的过程赋予了它新的内容。

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中外哲学的交流历程，就把握不了中国思想的特点，不懂得佛教，就抓不住中古时期中国思想的流变，不知道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学”，就无法梳理清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头绪。

凡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会是“独语”的文化，唯有“对话”才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唯有宽容才会有文化的繁荣与昌盛。

第二，会通是哲学交流的必然结果。西学和中学何为体？何为用？这个问题争了一百多年也没有弄清楚。80年代“西学热”，有人说只有西方文化才是人类的希望；90年代“国学热”，有人说下一个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越吵越糊涂。

其实答案就在历史中，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问题。佛教来自“西国”，天学更是“大西”的利玛窦先生传来，实践证明这两次“西学”的传入在中国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冲突，但最后的结果是“西学”变了“味”，天竺国的佛教变成了禅宗，罗马的基督教穿上了儒袍。想原汁原味的把“西学”搬到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利玛窦的弟子龙华民一改他的老师所确立的“合儒”政策，结果弄得个鸡飞蛋打，险些被赶出中国。反之，坚守夷夏之别，拒绝外来文化的鸵鸟政策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汤用彤先生早年就做过十分清楚的论证。他说：“一个地方的文化思想，往往有一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撞；又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

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精神。”这种冲突与融合的结果是：“本地文化思想虽然改变，但也不至于完全根本改变；但是外来思想也须改变，和本地适应，乃能发生作用。”汤先生的这个结论正是对中外哲学交流史的总结。

第三，在历史中发现真理。从理论上比较中西哲学，分析其各自的本质和特点，研究其各自的优劣，这是近年来从事比较哲学的一些学者所努力的。这种研究也的确取得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启发人的结论，如西方哲学以主客相分为特征，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特征；西方哲学重理性，中国哲学重直觉等等。

但仅此还不够，仅用这些结论还不能说明中西哲学实际发生的交流历史，不仅是不能说明历史，甚至历史的实际过程与这种理论的分析是南辕北辙的。

例如 18 世纪欧洲“中国热”时，启蒙思想家手中的思想武器竟是儒家学说，(孔子成为伏尔泰心中的圣人。伏尔泰此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不是什么“天人合一”，而是“自然理性”，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领袖怎么会将东方的一种封建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旗帜呢？知识论的社会学和空洞的中西文化比较都无法回答。

又如明末儒臣徐光启对天学的解释，清末思想领袖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五四精英们对康德学说的理解都有一系列的“变异”、“错位”、“文不对题”,但正是这种“变异”、“错位”、“文不对题”，却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就是文化交流中的“误读”，这种“误读”构成了全部的中外哲学交流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些“误读”的文本所构成的历史说明了脱离历史过程的那种空洞的比较研究是多苍白和无用。

人在历史中。历史赋予了他解释的“前见”，人不是一个纯粹理念的存在，他首先是被历史的传统和语言所制约的存在。因此，

解释学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回答人的历史文化存在的本体论。

那种脱离中西双方历史，不分古今，把传统现代混为一谈的比较研究，那种把中西双方只抽象为纯粹理念的比较研究都忘记了一个根本点：历史。

我们只能在历史中发现真理，所以没有历史背景的真理都是空洞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塑造了真理。

今天，在告别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时，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的思想，寻求新的真理，我们只能从我们已有的历史中迈出这一步，开始这种新的历程。中外哲学交流史的价值正在这里。

第一章
汉唐时期中国哲学对亚洲的影响

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在古代一直对周边地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上来讲，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交通与交流就十分密切，正是这种通商贸易、人员来往、纳奉朝贡、民族迁移以及征战和讨伐，推动了中国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之中，中国哲学的精神透过它的典章制度、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在朝鲜、日本、越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

隋唐时期，儒学思想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各国竞相模仿中国古代典章礼仪及教育制度，学习汉文和儒家经典，大量摄取汉唐儒学思想，并且将其与本民族固有思想相融合，试用于建立理想主义的国家新秩序和王道主义的政治统治，终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定位立足。

一、儒学传人朝鲜

1. 鼎立三分。

朝鲜史料《三国遗事》古朝鲜条云：“ 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于朝鲜。”箕子名胥余，原是殷纣王的叔叔，曾任太师之职，因劝谏纣王虐政而被囚。周武王推翻商朝，释箕囚。箕子不忍事二主，去了朝鲜。周武王因而以朝鲜封之。箕子到达朝鲜半岛后，“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① 为民制犯禁八条法；“……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②黎庶宁靖，小康太平。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箕子后裔 40 余代的箕否仍在朝鲜半岛北方为王，南方则由众多部落族国家把持。秦末战乱，几万名逃避战争苦役的秦人和一些漂洋过海寻求仙丹的秦人流移到朝鲜半岛南端的“辰韩”部落定居。至今一些史料仍将“辰韩”部落称为“秦韩”，就原于此由。箕否的儿子箕准继位之后，被燕人卫满击败，由海上逃往朝鲜半岛南端，组建了马韩部落。燕人占领朝鲜半岛北部，称“卫满朝鲜”。

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举兵灭掉卫满朝鲜，在卫满地域建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个汉行政区，实行汉制，统一使用汉文字。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寻求与朝鲜半岛南部各部落接触。本世纪 70年代在朝鲜庆丹附近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汉代铜镜、铁器等古物，说明辰韩部落与汉朝早有交往。

玄菟郡郡属高句丽县高氏族领朱蒙挑头反叛，割据一方，于公元前 37 年摆脱汉的统治，在国内城（今吉林省辑守市）自尊为王，称国号“高句丽”，之后高句丽逐渐向南扩大势力范围，于公元 427 年迁都平壤城。此时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部落在公元 346 年建立了百济国；“辰韩”与“弁韩”两大部落合并，于公元 356 年建立起新罗国，朝鲜半岛在公元 4 世纪时呈现三分鼎立的局面。

三国始建，最急需的是一套有效的治国安邦的方案。汉唐儒学思想恰恰可以为其指出一条捷径、提供一种方便。而三国均因无本民族的文字而不得不借用汉文字为书面语，这就为儒学在朝鲜的早期传播提供了土壤。

①② 《汉书》卷 28。

2. 西行朝贡。

自从中国周代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度之后“天子”便对内分封诸侯，对外以“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的王道思想安抚外藩。孔子的学生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亦曰“四海之内皆一家。”他们大多主张以仁义为本，以德行与征服相结合而实现“王天下”。中国诸侯国以外的四方小国为了寻求大国的保护，也纷纷前来向天子朝贡“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国依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中国各朝交往格外频繁。据中国《史记》和朝鲜《三国史记》记载：自汉朝到隋朝，三国向中国各朝朝贡 248 次，中国向三国派遣外交使节 20 次；仅从 618 年至 668 年的 50 年间，三国就向唐朝遣使 82 次。朝贡的主要内容是：向天子呈报国政，汇报重大事件，请命国号和王位，派遣留学生，邀请工匠和画师，请求赐恤援兵；进行礼节性访问、祝贺、谢恩、告哀、请婚，向天子进献贡物，领取回赐物。回赐物常有书籍典章经文。三国西行朝贡，具有政治、军事、文化意义，这一外交形式，“使韩国吸收引进了中国文化，并使其成为韩国的文化基础。可以说，这是朝贡的物产品结果，但这并不是朝贡制度产生的最初目的”。① 中朝的朝贡关系始于 3 世纪，成形于 7 世纪，盛行于唐代，此后断断续续延续到明清时代。通过这一交流途径，汉唐儒学被引进朝鲜。

3. 宿卫留学。

中国的唐朝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承平盛世，来往于长安的四夷首领们纷纷要求将王亲子弟派到唐朝学习汉文化。唐王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为大批公私留学生提供住宿、饮食，将其编为仪仗亲卫，置于国子监学习，称其为“宿卫”留学生。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学，四门亦增生员……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

①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第 76 页。

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威，近古未有。’①

宿卫留学生的学习期限为 10年，每 10 年更换一批。唐朝专门为他们设立宾贡科考试制，及第者与国内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被授予官位爵位。发给结业的学生文凭以回国做官，毕业后，他们可按自己的意愿或回国或留唐任职，来去自由。

宿卫留学生长期停留在唐朝，犹如驻唐文化官员一样，在学习的同时担当着文化使节的使命。从另一个角度看，宿卫留学生因为都是各国王亲子弟，所以也可以说是唐与诸夷国维持关系的人质。“宿卫”者实兼有留学生、学者、文化使节、人质、外交官等多种身份。

遵照以夏变夷的古训，唐朝广召“宿卫”学生，欲使中华文化融汇中外，囊括四海，从而达到“天下大治”之目的。朝鲜半岛三国为了直接摄取先进的汉唐文化以治理各自的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都于公元 640 年分别向唐朝请愿派遣本国王戚子弟入唐太学留学。公元 668 年，新罗国与唐朝军队联合灭掉高句丽、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之后，新罗国受到唐朝的最惠国待遇，赴唐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唐朝末期，新罗的宿卫留学生就有 38 人于唐宾贡科及第。其中名声颇大的有慧超、崔致远等。崔致远 12 岁赴唐留学，离家之前，其父勉励曰：“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后来果然不负父望，在唐登科及第。《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所记录：“崔致远有《四方集》一卷与《桂苑笔耕》二十卷”，“崔致远以高丽人宾贡及第，为高骈之从待官。在中国亦具盛名，有文集三十卷流传于世”。崔致远之作《桂苑笔耕》后来被收录在中国《四库全书》的四部丛刊，崔致远的名字被录入《中国人名辞典》之中，仅此一例，便可以说明当时三国留唐学生如何“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便相继不绝，常遣子

①《唐会要》卷 35。

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讨习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仪之邦”①

一批又一批留唐学生功成名就，结业归国，成为三国的大儒学者，名动天下，在朝鲜半岛上为传播发扬汉唐文化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汉唐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1. 读书三品。

在三国之中，高句丽最早“立太学教育子弟”。公元 372 年，高句丽小鲁林王二年创办贵族学校，模仿汉代以后的大学制度，以儒学经典的经学、史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同时教授汉文字、汉文学。到了高句丽后期，汉学教育就普及到下层。《新唐书》记：高句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务勉，衢侧悉构严屋，号扃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高句丽人普遍喜爱读书学习，各村在街旁建私塾，称“扃堂”，未婚青年在此就读习武。所学书籍有《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林》、《文选》等。这些书籍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伦理思想的精粹。

在太学中，由五经博士任教、由学长一人及书记官若干名管理学校。所谓五经博士，是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专家学者。汉武帝罢黜百家，唯承认孔子删定的五经为经典，指定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并担当儒学经典的教授。《梁书》百济条记：“百济遣使臣往梁，献百济物产，并请求涅槃经义及毛诗博士，另亦邀工匠、书家，王首诺。”这里所记‘毛诗博士’即指五经博士。百济从梁朝聘请五经博士授课，培养出了本国的五经博士。《三国史记》百济本记说，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百济有了五经博士

①《三国史记》卷 12。

之后，开始由五经博士高兴等用汉字书写。日本古书记记载，最早将汉字和五经传往日本的是百济的五经博士王仁。

新罗国统一了朝鲜半岛之后，于公元 680 年建立了国学。公元 788 年，“……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意，兼明论语、孝经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新罗国学中设置的读书三品科如下：

上品科 需精读《礼记》、《文选》、《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

中品科 需通读《曲礼》、《论语》、《孝经》。

下品科 需通晓《曲礼》、《孝经》。

由此可知，新罗国学的主要课程是儒学经典，其中又以《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的基础课。所有的学生都必须精通这两门课，然后才能进一步读《春秋》、《毛诗》、《礼记》，进而由经学扩展到文学、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多种学科。能够精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会被国家优先选用，如此将修学者分为上中下品来判定其学习水平，来决定是否为国家所重用。将《论语》与《孝经》为教学基础课，使人知“仁”而知己而忠君；知“孝”而知伦理而知人。直到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后，高丽朝末期，《孝经》才被《小学》所取代。

在研究儒学经典方面，“新罗薛聪以方言解九经，又以俚语制吏礼，行官府公簿”。[①] 三国时借用汉字为书面语，而口语则使用当地语言。为了普及儒学经典，薛聪用地方语言标示汉字的“吏读法”，注释了《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成为朝鲜注释儒书第一人。

2. 忠孝立国。

朝鲜史料《三国遗事》卷三记载：“……王又念欲兴邦国，须

①《艺文考》。

先风日道，更下令选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为花郎。”“……聚徒选士，教之以孝悌忠信，亦理国之大要也……”新罗国真兴王为了培养振兴邦国之栋梁，便在全国选出几百名品德高尚、品貌端正的青年男子，称为“花郎”；将他们组成一个修行团体，叫“花郎团”；“以孝悌忠信、五常、六艺、三师、六正教之”。花郎所修行之道叫做“花郎道”。这里所谓“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能；“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三种官称；“六正”指圣良忠智贞直的行为品质。

25 岁去中国留学的新罗圆光法师精通三藏和儒学，他曾为花郎徒受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这“事俗五戒”后来被称为花郎道的道规，从中可以看到花郎道思想的源流：勇敢、正直、孝顺源于朝鲜固有的民族传统；不杀生出于佛教的慈悲为怀；忠孝、信义、礼智出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中儒家的道德观念占据主要位置。花郎道精神体现了固有思想与外来思想的合流融汇。

花郎团的修炼方法具有浪漫特色，他们“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①] 花郎徒们共同切磋道义，并躬行实践，在修炼中培养好善憎恶、忠孝观念，磨炼成人格完备的有用之材。他们还以歌舞诗乐来陶冶其情操，培养乐天精神。朝鲜民族美的情操、爱的情感、爽直开朗的民族性格皆出于花郎道精神。花郎是新罗国理想人格的楷模，是人人仿效的样板。花郎徒们常常结团远行，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在绿水青山中激发出爱国爱民的情感，使花郎徒们的眼界从家庭扩展到国家，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由小家到大家继而转变到国家，从而产生以国家兴盛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国家危难之时，花郎徒们能挺身为国尽忠而不顾个人安危。“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从中“知其人邪正”之后，“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新罗因而人材济济，

①《三国史记》新罗本记 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民精神焕然一新，国势大振，最终借助唐朝势力战胜了强大于己的高句丽和百济国，于公元 668 年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3. 修己以安百姓。

公元 568 年，新罗真兴王在巡视边境时立了许多境碑。“黄草岭碑”上刻有“纯风不扇，则世道乘真，玄化不敷，则邪为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其中“修己以安百姓”，出自《论语》，这说明真兴王已经掌握了儒学的政治思想的根本，即民本思想。

开创新罗统一大业的文武王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朕身后愿为护国大龙，崇奉佛法，守护邦家。”曾有一法师疑问：“龙为畜报何？”文武王答曰：“吾厌世间之荣华久矣，若鹿报为畜，则雅合朕怀矣。”

文武王信仰佛教，他发誓愿死后让人们将自己葬于祖国的海边，使自己来世变成一条护国龙，来守卫国家海疆，保护人民生活安定，防止倭寇的入侵。他在遗嘱中还讲到：“朕于百姓，减赋税，轻征兵与徭役，足民生，安百姓”，“使国家经济富强，无罪犯”。文武王相信佛教的涅槃果位，但他宁愿倒着轮回，也坚决地希望将自己的来生变为一条龙的原因就在于此，比起个人的安危幸福来，文武王更关心保国安民的大事，他至死不忘减轻人民的徭役疾苦，他厌恶“世间之荣华”，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个人的一切包括宗教信仰皆可抛弃，他甘愿成为守护人民的龙，不去求个人的来世解脱，真正是“非欲受世人服侍而生为王，乃为服务万民而生为王者”。他既是支配人者的君主，又是服务于人民、献身于国家的真正王者。他在遗嘱中所说的“崇奉佛法”，不过是想借以说明他实践儒家王道政治理念、民本思想的坚决和彻底性。文武王虽没有去西方净土世界，但他葬身的东海边，至今仍是朝鲜人朝拜祖先的圣地；他献身的事迹永远是朝鲜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金石稷谏真平王一事也是人们交口称颂的君臣之义的范例。

真平王好狩猎，常因此而不理国事。金石稷上谏曰：“……书（书经）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惑不止。由是观之，内则荡心，外则亡国，不可不省也，殿下念念！”金石稷向王讲载舟覆舟之理，王亦不听。金石稷便留下遗言而后使人将自己埋于王狩猎的路旁。王狩猎行到此处，问明事由，涕泪滂沱，由衷感叹：“夫子忠谏，死而不忘，其爱我也深矣，若终不改，其何颜于幽明之间耶！”自此，王终身不猎。

“修己而治人”的思想在新罗统治阶层里体现在正君心、正臣心以安百姓上。当时广为流传的安民歌中唱道：“君者，父也。臣者，慈母也。百姓者，愚昧无告之婴孩也，百姓将知其所爱，飘摇流荡之庶民，浴君臣之爱，引导我吧——。”百姓视君为父、臣为母、国为家。君爱民，臣忠君，民泽恩而颂。人际关系按照儒家政治理念而协调，形成父母之邦，民安国泰，百姓刻骨铭心、心融神会：“舍弃此土将何往？将知心怀国家，君君、臣臣、民民，则国将太平！”

三、早期朝鲜儒学的特点

1. 文者道之器。

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古代国家都因无自己民族的文字而借用汉文字进行对外交流，对内普及文化教育，用汉文创作文学作品，记录各自的历史。高句丽早于百济、新罗建国，而且是在原来汉朝统治区域内建国，所以一建国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文基础，“国初始用文字”，用汉文记《留记》百卷。为了普及汉文，官办“太学”，私办“扃堂”，学校中所使用的教科书是汉代以后中国各朝皇帝赐赠的书籍，或是朝鲜人从中国购得的《五经》、《史记》、《汉书》、《字林》、《千字文》等汉学和儒学经典著作。三国人在普及汉文字的教育中，渐渐习得儒家的教育、伦理、礼仪思想和政治理念，并且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到了三国中叶，汉儒典章制度

已成为学习重点，此后逐渐向经学研究方面发展。朝鲜学习引进儒学并非最初的目的，而是由输入汉字而导致的最终结果。所以最初使用普及汉字，首先注意的是汉字字、辞、义及汉诗辞章的学习。儒学经典作为教科书输入太学以后，儒学在朝鲜才逐渐发挥了社会教育机能。韩国有名的儒学者柳承国教授说：“……儒学思想以帝王之学提供治国原理，并担当着人间教养的教育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的角色，而这些主要皆通过儒教经典而习得。尤其汉文的传来，形成古代文化发展的契机。不管是外交文书的交换、诗文的制作、历史的记录等，皆有划时代的贡献。”

早期的朝鲜儒学是以汉字、汉文为学习重点的，对儒学只是一个初期学习、理解阶段，在理论上没有更深层次的研究。

2. 以道与治。

“以道与治”是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给儿子留下的遗嘱。以道与治即文治，非以力而治。高句丽人本为游牧民族。“其人性凶急，喜寇钞”；“国人有气力，习战斗”。① 东明王被众人喻为“朱蒙”，就是因为东明王从小能弓善骑，百射百中。人们习惯将勇敢善战的人称作“朱蒙”。在古代部落争战中，朱蒙是人们心中的领导者。“朱蒙”初以武取国，重武轻义，直到接受了汉唐文化，认识到一种比武治更有力的先进的治国方法之后，才开始尝试使用文治的方法，此时朝鲜民族正处在一个由狩猎为主向农耕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对早期儒学的吸收，无疑促进了这种文明进化过程，并且还改变了古代朝鲜人的气质，使古代朝鲜人由勇猛慓悍转向文质彬彬，由重武轻义转向文武并重了。但是，古朝鲜人当时对儒家的王道思想、文治理论并没有理解得那么透彻，“以道与治”只是东明王为后人指出的一个方向、一种理想。此后，历代君主便努力沿此方向去追求一种理想主义的大同国家。

朝鲜三国初呈原始生活状态，“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

①《魏志·高句丽条》。

邑落杂居，不能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百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① 三国中期开始尝试行儒学，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风俗大有改进。如百济国，“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成事则行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敬，妇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编发盘于首后，垂一道为饰，出嫁者，乃分为两道焉”，“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抚其赃两倍征之，妇人犯奸者，没入夫家为婢，婚娶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②

在政治制度方面，三国多仿效中国。高句丽建国初即颁布了律令，其法源于周礼；百济王模仿中国“六典”设六佐平和十六官阶品，以六大臣分掌国务，将全国分为二十二个檐鲁；所治之城名为固麻，称邑为檐鲁，此乃同中国之郡县， 其国之檐鲁皆分举王族子弟或宗族……”百济还使用中国历法。新罗建国初时实行集体领导制，“官凡十有七等，事必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事事由六部村长拜天神而定夺。这种被称做“和白会议”的方式后来改为“南堂制”。“二十八年春正月，初吉，王服紫大袖袍，青锦袴，金花饰乌罗冠，系皮带乌韦履，坐南堂听事”。③ 百官众臣穿中国官服升堂问政，问政处所称“南堂”，又称“都堂”。到后来的高丽朝时改称“都评议使司”了，李朝时代又叫“议政府”。

“南堂”之称谓来自“明堂”一词。《礼记》明皇篇中的“明堂”是祭天奉祖、诸侯相会、进行各种大典的场所。《礼记》中说“明堂”指南向之屋，非南之屋的南室即是南堂。《周易》说卦篇中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新罗的“和白会议”与“南堂制”明显不同的是封建君主的专制的加强。

接受了早期儒家思想后，朝鲜三国的民间信仰逐渐由山神、天

①《三国志·马韩条》。
②《周书》。
③《三国史记》新罗右尔王 28 年条。

神、多神信仰转向对君主、英雄、祖先等人间神的信奉，“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可汗神、箕子神，国城东有大穴名神隧，皆十月,王自祭之”。①最初人们的祭祀场地是大自然间的山下或河边，后依礼将祭场移至屋内，在庙室内设先祖牌位供奉之。人们认为神意取决于王之德性如何，王是否能够率民循天意而动。每逢大事，均要汇报于神。如新罗文武王统一朝鲜半岛后即位时，首先率文武众臣朝谒先祖庙，告曰：“祇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兹敢控告，神之听之。”

3. 网罗四方。

唐玄宗曾下诏书称赞新罗是“仁义之国”、“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诚矣天其鉴②位于朝鲜半岛南侧的新罗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距中国战国时期的齐国较近。新罗的学术思想有可能很早就受到过齐国“稷下之学”的影响。因为早于《史记》提到朝鲜的史料是稷下学者所作《管子》篇。新罗早期无固定国名。《晋书·张华列传》说“: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靠海,去州四千里,历世来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这里的“新弥”推定为新罗。直到智澄王四年才“复国号新罗”。新罗的含义是“: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③这里所言‘德业’出自《周易》乾卦九二：“……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日新”一语出自《周易》大畜卦“: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新罗的“罗”字所具有的“网罗四方”之意便是由“德业日新”中推出的大畜精神。

齐国的百余年间，君主好广招天下贤人聚众讲学，“不治而议”。不少名儒集聚稷下学宫而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指导国略大策的理论方针多出自稷下学者之笔。这种行德业、尚贤养贤之风

①《旧唐书》高句丽条。
②《三国史记》圣德王条。
③《三国史记》卷 4。

也影响到了新罗。新罗花郎徒的聚集修炼，正是新罗受到大畜精神的启发而养贤育材的举动。“王又念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聚徒选士……亦理国之大要也”待养精蓄锐、刚健笃实之后，新罗便一举灭掉高句丽和百济，统一了半岛，真正“辉光日新其德”，创下了历史功绩。

尽管新罗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后来的朝鲜学者对此却贬褒不一。其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新罗过于亲唐而丧失了民族自尊，过于慕华而险些被同化。如柳承国教授的评论：“新罗知识人鼓吹儒学思想，孝顺父母，为国尽忠，临战不退，于信义社会的形成，担当了肯定的角色。但是在……倾慕语文化之余，易忘却自我文化的固有性与特殊性，而事实上确有过分被外来文化同化的倾向。”由此可见汉唐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

第二节　儒学传入日本及其影响

儒学传入日本，是同汉字传入日本同时开始的。就是说，中日文化的交流，发轫于儒学传入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当以此为开端。

中国的儒学作为一种先进的异质文化，传入日本之后，经过初传、发展、吸摄和融合，在异国历史文化和习俗的培植和浇灌下，不断地生长发育，最终成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枝璀璨的花朵。

儒学东渐日本，最早是以朝鲜为媒介而进行的。大约在公元284年，百济使者阿直岐到达日本，并成为日本皇子的汉学老师，主要讲授儒学。次年，经阿直岐推荐，百济博士王仁前往日本，带去《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日本应神天皇之子稚郎子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